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

总编 李 新

中华民国史

人物传

第六卷

李 新 孙思白 朱信泉 赵利栋 主编
严如平 宗志文 熊尚厚 姜献阁

中华书局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

总编 李 新

中华民国史

人物传

第六卷

中华书局

第六卷目录

T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太虚 | 韩廷杰(六/3371) |
| 谈荔孙 | 汪仁泽(六/3376) |
| 谭浩明 | 刘立道(六/3381) |
| 谭平山 | 刘秋阳 吴明光(六/3386) |
| 谭人凤 | 周天度(六/3392) |
| 谭曙卿 | 李锡贵(六/3396) |
| 谭鑫培 | 白吉庵(六/3401) |
| 谭延闿 | 李静之(六/3406) |
| 汤恩伯 | 沈荆唐(六/3414) |
| 汤尔和 | 娄献阁(六/3419) |
| 汤化龙 | 曾业英(六/3425) |
| 汤寿潜 | 郑云山(六/3431) |
| 汤芑铭 | 经盛鸿 殷文(六/3437) |
| 汤用彤 | 宗志文(六/3442) |
| 汤玉麟 | 张学继(六/3445) |
| 汤子敬 | 李本哲(六/3452) |
| 唐继尧 | 谢本书 孙代兴(六/3456) |
| 唐群英 | 罗绍志(六/3464) |
| 唐绍仪 | 郑则民(六/3470) |
| 唐生智 | 李静之(六/3476) |
| 唐拾义 | 汪仁泽(六/3484)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唐文治 | 毕 苑(六/3487) |
| 陶成章 | 尚明轩(六/3492) |
| 陶希圣 | 贺 渊(六/3497) |
| 陶行知 | 宗志文(六/3505) |
| 陶孟和 | 涂上颿(六/3511) |
| 滕虎忱 | 王家鼎(六/3515) |
| 田耕莘 | 雷镇闾(六/3521) |
| 田 汉 | 陈小村(六/3524) |
| 田颂尧 | 马宣伟(六/3531) |
| 田 桐 | 徐辉琪(六/3536) |
| 田文烈 | 罗幼娟 邵桂花(六/3542) |
| 田中玉 | 邵桂花(六/3548) |
| 佟麟阁 | 范立君 于晶娜(六/3554) |
| 土肥原贤二 | 汪仁泽(六/3560) |

W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万福麟 | 丘 琴 姜克夫(六/3565) |
| 汪大燮 | 朱杰仁(六/3572) |
| 汪逢春 | 寿祝衡(六/3580) |
| 汪精卫 | 闻少华 丁贤俊(六/3583) |
| 汪康年 | 汪仁泽(六/3598) |
| 汪笑侬 | 汪仁泽(六/3604) |
| 王伯群 | 熊宗仁(六/3609) |
| 王伯元 | 董建侯 宋紫云(六/3616) |
| 王承斌 | 邵桂花(六/3620) |
| 王宠惠 | 郑则民(六/3628) |
| 王光祈 | 李义彬(六/3636) |
| 王国维 | 耿云志(六/3642)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王和顺 | | 黄碧琴(六/3645) |
| 王怀庆 | | 张学继(六/3650) |
| 王家烈 | 周春元 | 林国忠(六/3656) |
| 王家襄 | | 夏高阳(六/3660) |
| 王金发 | 裘士雄 | 徐和雍(六/3665) |
| 王金铭 | | 梁旭毅(六/3671) |
| 王荆山 | 马国晏 | 刘 轡(六/3676) |
| 王闾运 | | 白吉庵(六/3680) |
| 王克敏 | | 王春南(六/3685) |
| 王乐平 | 刘培卿 | 刘 镇(六/3690) |
| 王陵基 | | 刘识非(六/3695) |
| 王懋功 | | 陈德军(六/3701) |
| 王少堂 | 倪 波 | 沈道初(六/3706) |
| 王世杰 | | 严如平(六/3708) |
| 王士珍 | | 公孙旬(六/3714) |
| 王 泰 | | 庞守信(六/3720) |
| 王天培 | | 熊宗仁(六/3724) |
| 王天纵 | | 综 文(六/3728) |
| 王统照 | | 鲁 海(六/3732) |
| 王文华 | | 熊宗仁(六/3737) |
| 王希天 | | 任秀珍(六/3743) |
| 王小航 | | 娄献阁(六/3750) |
| 王晓籛 | | 汪仁泽(六/3755) |
| 王性尧 | | 罗九和(六/3761) |
| 王亚南 | | 林其泉(六/3765) |
| 王亚樵 | | 姚怀然(六/3770) |
| 王尧臣 | 王禹卿 | 朱复康(六/3775) |
| 王揖唐 | | 萧栋梁(六/3780) |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王一亭 | 汪仁泽(六/3784) |
| 王以哲 | 张玉芬(六/3789) |
| 王荫泰 | 朱佩禧(六/3796) |
| 王永江 | 武育文(六/3802) |
| 王用宾 | 萧栋梁(六/3809) |
| 王芸生 | 熊尚厚(六/3812) |
| 王云五 | 熊尚厚(六/3818) |
| 王造时 | 江绍贞(六/3825) |
| 王占元 | 张振鹤(六/3831) |
| 王 振 | 庞守信(六/3836) |
| 王正廷 | 郑则民(六/3840) |
| 王芝祥 | 王 川(六/3847) |
| 王志莘 | 吾新民(六/3854) |
| 王郅隆 | 熊尚厚(六/3858) |
| 王缙绪 | 马宣伟(六/3861) |
| 卫立煌 | 严如平(六/3865) |
| 魏 如 | 李新辉(六/3873) |
| 温生才 | 杨天石(六/3877) |
| 温宗尧 | 邵桂花(六/3880) |
| 闻兰亭 | 汪仁泽(六/3887) |
| 闻一多 | 王子光(六/3892) |
| 翁文灏 | 严如平(六/3899) |
| 吴鼎昌 | 熊尚厚(六/3905) |
| 吴光新 | 张学继(六/3911) |
| 吴国桢 | 颜 平(六/3915) |
| 吴晋航 | 袁嘉新(六/3920) |
| 吴经熊 | 李在全(六/3924) |
| 吴景濂 | 张树勇 张黎辉(六/3929) |

- 吴俊陞 孙德昌(六/3934)
- 吴克仁 姜克夫(六/3939)
- 吴禄贞 李宗一(六/3944)
- 吴懋鼎 熊尚厚(六/3948)
- 吴佩孚 李宗一(六/3952)
- 吴奇伟 戴仰明 林熙敦(六/3961)
- 吴清源 顾大勇(六/3965)
- 吴世荣 陈 民(六/3970)
- 吴铁城 郑则民(六/3974)
- 吴暘谷 马陵合(六/3980)
- 吴耀宗 汪仁泽(六/3987)
- 吴贻芳 王 娟(六/3994)
- 吴有训 李援朝 齐 辉(六/3999)
- 吴 虞 吴嘉陵(六/4004)
- 吴 樾 尚明轩(六/4009)
- 吴蕴初 朱信泉(六/4013)
- 吴兆麟 闻少华(六/4018)
- 吴稚晖 严如平(六/4022)
- 吴忠信 沈荆唐(六/4028)
- 武百祥 辛培林(六/4033)
- 伍朝枢 郑则民(六/4038)
- 伍连德 陈 民(六/4043)
- 伍廷芳 郑则民(六/4046)

太 虚

韩廷杰

太虚和尚，俗姓吕，名淦森。法名唯心，字太虚。浙江崇德（今并入桐乡）人。生于1890年1月8日（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）。五岁丧父，六岁丧母，幼时多病，由外祖母抚养成人。外祖母虔信佛教，对他有很大影响。他九岁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。十三岁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，从此萌发出世思想。十六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。当年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。同受戒者数百人，太虚年龄最小，但答问戒律名列第一。

清朝末年，革命思潮日盛。与太虚同寺的华山法师教育他以革新之路求佛教的复兴，让他阅读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炳麟、谭嗣同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。太虚十分欣赏谭嗣同的“仁学”，用以自励；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。

1909年冬，太虚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僧教育会，这是他从事佛教运动的开始。1911年，太虚赴广州宣扬佛法，被推为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。他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，因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而招忌，潜返上海。

为了加强各佛教寺院的联系，复兴并发展佛教势力，太虚于1912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。当时寄禅和尚领导组织中华佛教总会，“协进会”即合并于“总会”，由寄禅任会长。不久，寄禅死于北京。上海开追悼会，太虚在会上提出“教理革命，教制革命，教产革命”的口号。“教理革命”，是反对探讨死后问题，主张用佛教解决现实问题；“教

制革命”，是主张设“佛法僧园”，统管全国僧务；“教产革命”，是反对宗派继承教产、私有私占，主张寺院财产属全体僧众所共有。

中华佛教总会 1913 年在上海正式成立，太虚任该会机关刊物《佛教月报》总编辑，发表了《宇宙真理》、《致私篇》等论文。这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一时期。他的佛教观点基本上是承袭古人的，用“宗下”和“教下”说明佛法的全部内容。他所说的“宗下”，是指不用语言文字，只求自悟自证的禅宗；他所说的“教下”，是指由语言文字所建立的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三家，也可以包括律宗、净土宗和密宗。他的这种观点反映在上述几篇论文中，也反映在他撰写的《佛法与调整》这本小册子里。

1914 年，太虚在普陀山锡林禅院闭关治学，钻研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禅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密宗、三论宗等，旁及古今东西之学，著有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、《成大乘论》、《法界论》等。这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，他的佛学观点基本形成。他认为：小乘可附属于大乘，即所谓“附小于大”，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。至于天台、华严、三论、法相、禅、律、净土、密这大乘八宗，它们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极果都是一致的，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，只是说明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。这就是他所说的“八宗平等”。但实际上，他更倾向于禅宗。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在《大乘宗地图》中。

太虚于 1917 年春漫游台湾地区和日本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佛教。后他与蒋作宾、黄葆仓、陈元白、章炳麟、张謇、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“觉社”，由他主编《觉社丛书》。1919 年初，改名为《海潮音》月刊，移杭州净梵院，他继续担任主编。不久，太虚应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之请，到长沙讲学，并成立长沙佛教正信会。冬天回杭州，途中写成《新的唯识论》。他把“新的唯识论”看成是真唯识论的应化身，用新近的学术思想予以阐明，以适应现代思潮，结果遭到以圆瑛为首的一派佛教徒的反对。

1923 年以后，是太虚思想发展的第三时期。与前两期迥然不同，

“不为旧来宗派所拘束，而欲将释尊流传到现代的佛法，作圆满的判摄罢了。这期可分‘教’、‘理’、‘行’三者来讲……”^①他所说的“教”是对释迦牟尼等佛教导师遗教的研究；所谓“理”是对佛教理论的探求；所谓“行”是指佛教修炼，如持戒、坐禅、念咒、念佛等。

太虚为了复兴庐山大林寺的佛教，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，曾先后邀李隐尘、张仲如、黄季刚、汤用彤等开暑假讲演，使沉寂数百年的庐山佛教复活。来听讲者多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外人士。太虚由此产生联合世界佛教徒、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的思想。他于1924年夏天在庐山召开“世界佛教联合会”，日本、德国、美国、芬兰等佛学家都赶来参加。太虚在讲话中，结合大乘佛教“利他”教义，阐明反对战争、反对侵略的主题。

为了改革佛教、培养骨干，太虚热心于筹办僧侣教育机关。武昌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、汉藏教理院等都是他一手筹办的。他还在上海创设佛化教育社，出《心灯》旬刊，进行佛教宣传。他在武昌佛学院讲《志行自述》，提出“志在整理僧伽制度，行在瑜伽菩萨戒本”的口号^②。武昌佛学院采用日本佛教大学教材，管理制度参用丛林约规，早晚诵《弥勒上生经》。

1924年，太虚在《海潮音》第五卷第二期发表《新僧》一文，主张僧尼都应当受教育，接受新思想，以适应时代的要求。后来兴起的新佛教运动，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，僧众把太虚拥戴为新佛教运动领袖。

1927年，太虚受转逢、常惺、会泉等之请，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，兼闽南佛学院院长。秋天，应蒋介石之请，在溪口雪窦寺为蒋讲《心经》，从此深受蒋介石器重。这一年，他还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。

① 太虚：《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》，《海潮音》第二十一卷第一期。

② 海潮音社：《太虚大师行略》，汉藏教理院同学会等编《太虚大师纪念集》，1947年版，第8页。

太虚于1928年6月8日发表《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》，对唯物辩证法极端仇视，把努力“俗化”犯“幼稚病”的僧人说成是“恰犹国民革命中杂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一般危险，此则非速加以清除不可”^①。他在《训词》中仿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“三佛主义”的口号：（一）佛僧主义。建立“有主义、有组织、有纪律的革命僧团”^②，坚持寺产属僧众所共有，严守戒律，对违犯者要规劝，以至于勒令还俗。（二）佛化主义。大力发展佛教徒，只有僧侣组织是不够的，还要建立居士组织。（三）佛国主义。即用佛教影响国家，以至于全世界。他提倡由僧众信众联合组成“中国佛教信徒会”或“国际佛教信徒会”，以加强中国和世界佛教徒的联系，扩大佛教影响。春天，蒋介石过访杭州灵隐寺，邀请太虚进京讲《佛陀学纲》。为了健全佛教组织，推进佛教文化运动，太虚得蔡元培、戴季陶等赞助，以李子宽、黄忏华、谢铸陈为骨干，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，同时发动筹组中国佛教会。

1926年，太虚遍访南洋群岛，并于1928年秋，去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美等国宣讲佛学。他应法国学者建议，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。回国后，写成《环游记》。太虚是中国僧侣去欧美传播佛教的第一人。他的传教活动受到各地反动头目的赞赏。希特勒在接见他时指出：“欧洲青年需要东方宗教了（专指佛教）。是的，东方宗教岂止东方而已。”^③蒋介石在致谭延闿的信中也吹捧说：“沙门太虚，著作等身，苦学潜修，垂三十年，此番赴欧美弘法，为国宣劳，玄奘以还，斯为第一。”^④

1929年，中国佛教会成立，太虚任常务委员，1932年，应蒋介石之请，一度任雪窦寺住持。

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，太虚多次电告日本佛教

① 太虚：《人生佛教》，海潮音社1945年版，第2页。

② 太虚：《人生佛教》，第4页。

③ 成德：《太虚大师的思想体系》，《太虚大师纪念集》，第65页。

④ 续清：《太虚大师救国救教救世之真精神》，《太虚大师纪念集》，第11页。

徒：本着佛陀“大悲兼利”的精神，佛教徒联合起来向日本政府抗议，促使它停止对中国的侵略。1938年，太虚历游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省讲学，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战救国事业，指导筹组训练僧众救护队，分发各战区服务。1939年，太虚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。秋，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、印度、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、新加坡等国，阐明中国抗日救国的政策，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太虚和蒋介石的关系比较密切。1946年元旦，国民党政府授以宗教领袖胜利勋章。在《海潮音》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，太虚发表《青年知识僧的出路》一文，认为“若要中国能够好起来，无论如何要由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公正的知识分子、产业分子联合教导资助着大多数贫苦劳动工农，共同警觉着土劣贪恶的毒害……然后当政的民权民生主义的政治才能实际施行，才能走上现代国家社会的大路”。太虚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蒋介石。他抄录旧作一首登载于《海潮音》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上，对蒋介石歌功颂德，云：“党国安危系，青山未是归。出曾惊鬼侮，退岂貽人讥。此日藏云豹，他年缚海豨。大雄能大忍，莫使素心违。”并在注释中称：“民十六年秋，蒋主席倦勤，邀余雪窦晤谈，曾赠此诗。日本海豨今已缚，喜而书之。”年底，国民党政府内政部、社会部在重庆组织“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”，太虚被推为主任委员。

1947年5月7日，太虚患脑溢血症死于上海玉佛寺，遗著有《太虚大师全书》等。

谈 荔 孙

汪仁泽

谈荔孙，字丹崖。祖籍江苏无锡，寄籍江苏山阳（今淮安）。1880年12月13日（清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）生。祖父谈静山曾在山阳县作幕友，后入蜀任夔州知府，归里后在山阳定居，对官场灰心失望，嘱子孙不入仕途。1891年捐资创办谈氏东文学堂，延聘日籍教员授课。父亲谈亚蘧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。谈荔孙少时就读私塾，1892年入东文学堂学习文理科和日文，1896年初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。

1900年谈荔孙在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，考取公费留学日本，守“不入仕途”的祖训，自选东京高等商业学校，攻读银行经济专科。由于谈曾在东文学堂学过日文，加以学习勤奋，因此学业优异，毕业后在日本银行界实习。谈的同学除吴鼎昌、钱永铭、王冶昌等外，尚有日本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。大仓财阀当时在日本创办化工、制麻、制革、酿酒等公司企业，设有注重实务的大仓商业学校，并侵入我国东北，经营煤矿等多种实业。大仓的经营思想，给年轻的谈荔孙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06年谈荔孙应张謇之聘，回国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。他在教学中，采用大仓商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，开办银行实践室，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银行、会计人才。

1908年8月，谈荔孙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，以成绩优等，得授商科举人，派任度支部主事，但谈仍“不入仕途”，坚请调离。

适值清政府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，遂调谈任大清银行稽核。

辛亥革命后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任职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和流通事宜。1912年2月，大清银行清理结束，另组中国银行，谈奉派赴北京接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，主持建立全行的新式会计制度；后又转任国库局长，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等。

中国银行为了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，掌握该地区的财政权，选派谈荔孙赴南京筹建分行。1914年，南京分行成立，谈任行长，并次第在汉口、九江、安庆、芜湖、镇江、徐州、苏州、常熟、杭州、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。除经营工商业信贷、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，主要是代理国库，并发行印有省区名称字样、限在各该省内使用的中国银行纸币。

1916年3月，袁世凯废除洪宪帝制后，为筹措军饷，依靠中国、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，以致京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。5月，北京政府明令停兑，致使风潮扩大，造成市面混乱，不久波及南方。为了维持银行信誉，谈荔孙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、张嘉璈，拒不执行总行的“停兑”命令；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京政府长江巡阅使、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，以省库为担保，无限制收兑当地印有省名的中、交两行纸币，不久挤兑风潮在南方即告平息。

1917年7月，张勋复辟失败后，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职位，于次年调谈荔孙为北京中国银行行长。此时冯国璋意欲另组金融机构，为其政治目的服务；而谈亦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难以施展其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抱负，渴望创办商业银行又缺乏资金，双方的意愿为江苏省会警务厅长王桂林所悉。王是冯的亲信，亦是谈的挚友，经王穿针引线，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（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），李纯、齐燮元等人认股十万元，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等，凑得股金三十八万元，由谈负责筹建商业银行，定名为“大陆”，股本额一百万元，实收五十万元，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。由于冯国璋的关系，验资等手续十分顺利，不久颁发执照。1919年3月，大陆银行正式成立，设总行于天津、分行于北京，谈荔孙被推选为董事长，张调宸、王桂林等为董监事。

1920年4月,安福国会开会时,有人指摘谈荔孙身为中国银行行长,又兼任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,与法制不合,有公私不分之嫌。谈闻讯后,决然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国银行职务,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。

谈荔孙久欲仿效大仓经营思想以施展才能,任职中国银行时,因与政局浮沉息息相关而难展所长,如今专心经营大陆银行,得以实现其抱负。他的指导思想是:重视储蓄业务,吸收社会游资,通过调剂金融,输送给工商企业,逐步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,做一个大仓式的实业家。在谈的筹划下,大陆银行于1920年3月在上海设立分行,翌年春,天津总行迁入新厦。大陆银行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国内外汇兑业务外,由于与黎元洪等人的关系,故能吸收军阀和官僚的大量存款。又大力开展银行的信托、储蓄业务,在京、津、沪三行分别设立保管、信托两部,建有水泥保管库,首创出租保险箱、接受露封保管和信托业务(代管点明数额的有价证券、股票、契约等,并代办取息、转期、投资经营等)。1922年夏,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,设计多种名目的储蓄,其中如“特种定期存款”,一次存入一百七十元五角一分,十五年到期后可得本息一千元。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里,颇能吸引一些储户,开办当年,仅天津一地,储户即达一千一百余户,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多户。在此期间,大陆银行的各种存款总额常在二千万以上。

谈荔孙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,便利客户,1922年指示天津总行在劝业场、梨栈、小白楼等处分设支行六处,开同业的先例。此后北京、上海以及陆续设立的汉口、南京等分行也纷纷仿效,在市内以及济南、青岛、滕县、苏州、杭州等多处设立支行。

在谈荔孙的主持下,大陆银行参加了和盐业、金城、中南共同组成的“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”,合办“四行准备库”,联合担保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,并合办“四行储蓄会”,建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上海国际饭店。

谈荔孙办事严谨,对于大陆银行的放款业务,时以稳健告诫所属。鉴于银行放款多需以实物做抵押、以存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,因此谈荔孙以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投放的重要环节。1925年,大陆

为与在天津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,除在万国桥堍自建仓库外,另又租得两处,规定客户以该行仓库所出栈单做抵押时,贷款利息可受优待,押款金额也可放宽至货价的八折,因此深受欢迎,业务逐渐发展,每年押款在一千万元以上。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,最后不得不将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。大陆沪行亦在谈荔孙的倡议下,自建仓库于北苏州路,1928年押款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元,仅次于津行。与仓库业务有密切联系的是保险业务,1931年,大陆与金城、中南、交通、国华四银行,合营太平保险公司,谈任该公司董事。此外,从大陆银行拨出部分资金,在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,从事进出口业务,与外商进出口行相竞争。

1931年春,谈荔孙患高血压病日趋严重,但为贯彻其化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以利国利民的初衷,未听众人的劝告作长期休养和治疗,而仍抱病去黑龙江调查大豆的产销情况,并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日产一千五百担的全套榨油设备,积极在该地筹建大型榨油厂。后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略战争,被迫中止筹备事宜,赔偿西门子洋行损失一万五千美元。他痛感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下,要实现其抱负极为困难。

1932年春,谈荔孙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,以财力支持傅在绥筹建毛纺织厂。该厂建成后,利用当地羊毛织出毛毯、呢绒,行销华北、西北各地,为当地毛纺工业奠定了基础。

谈荔孙曾于1929年春在大陆银行董事会上提议:调整人事,聘用具有金融和工商业管理方面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才,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;但多数董事系旧军阀、官僚,鼠目寸光,惟求眼前利益,认为选用新人进行改革,势必增加开支;且人事一经变动,原有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入行的人员有被淘汰之虞。因此会上虽表示原则同意,但力言以缓行为宜,使谈的打算受到阻遏。谈并不气馁,其后又制订了具体计划,在总经理处增设顾问室,拟延请学者、名流和富有经验的人士,指导全行工作,进行内部整顿。但谈荔孙初愿未遂,突因脑溢血症于1933

年2月25日在北平去世。

主要参考资料

谈季桢、谈在唐：《大陆银行的兴衰纪略》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3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

《锡金谈丹崖先生年谱》，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校学生辑《谈丹崖先生纪念册》，1934年版。

谈沅：《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》，淮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《淮安文史资料》第7辑，1989年版。

[美]柏脱等编，勃德译：《中华今代名人传》，上海传记出版社公司1925年版。

《大仓喜八郎》，日本《大人名事典》卷1，东京平凡社1962年版，第466页。